

石原莞尔的世界帝国构想

——“九·一八”事变背景的透视

苏拯中

一、引言

“九·一八”事变至今已47周年，在这近半个世纪中，学者对于事变发生的经过及真相致力很勤，但对事变发生之根本原因只有少数学者各站在本国或本身的立场和观点试探过，而关于事变计划的主角，当年关东军的参谋——石原莞尔的思想背景等绝少提到，以致事变发动的日本人的根本构想至今不明；有将事件归因于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亦有人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刺激；或云中日民族思潮的冲突；或云中国民族统一意识被漠视，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事变的借口而已。

在石原的“世界的最终战论”构想中，是以战争为手段来达到征服世界，然后以日本为中心成立一个“和平”的世界帝国，以日本天皇来领导世界，谋求人类的“幸福”。在统一之前，战争是无可避免的，统一的最大障碍为美国与苏俄，为要取得东方的霸主地位，以图最后与西方的代表——美国进行决战，必须先征服苏联，而“满蒙”的占有是在对美苏持久战中重要的一环，盖“满洲”的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是走向世界帝国途中所不可少的。故石原的世界帝国的谋略包括三个重要部分，即满蒙的占有，对美做战以及对苏作战，今就石原的原始资料中耙梳整理，分析如后：

二、石原其人

石原莞尔，1889年（明治32年）1月生于日本山形县。1909年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毕业后再进陆军大学。在陆大毕业时，学校对他的评语是：“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办以来最优秀的，”但对其为人却说：“粗野且不在乎”。1919年——1921年（大正8年—10年）间随日本“中支派遣队司令部”驻扎于汉口，在此期间，与他旧识板垣征四郎过从甚密，遂建立了二人日后在“九·一八”事变的搭档基础。1922年（大正11年）又调回陆大担任兵学教官，不久赴德国留学，1925年回国，仍任陆大教官，1928年（昭和3年）8月10日晋升为“中佐”（中校），10月10日调关东军参谋，后兼作战主任，驻在旅顺，正是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后的4个月，也是“满洲青年联盟”成立后的1个月。当时，东北方面排日运动正如火如荼，石原身兼作战主任，为了应变，他随时准备对华作战。

士官学校与陆大的教育以及留德期间对于欧洲战史的研究，加上其后对于日莲宗的狂热，构成了石原对于战争史观、国家观及人生观的架构，因而造成了他狂妄的“满洲领有”论调。

石原在关东军中虽只是一名中佐参谋，但他兼任作战主任，又与板垣征四郎（时任高级参谋）为莫逆之交，二人密切搭配。由于石原“优秀”的头脑以及“犀利”的洞察分析力，再加上他对军事的知识和战争史的研究，遂成为关东军乃至后来陆军部中唯一的“计划制造人”，板垣对他依为股肱。板垣是前辈，他对石原的赏识是在1929年（昭和4年）7月，关东军实行“北满参谋旅行”石原在长春旅社中讲演“战争史大观”之时，当时板垣即留有深刻印象，所以后来对石原的计划言听计从，因而有“石原智谋、板垣实行”或“石原理论、板垣实力”的说

法，充分说明石原的构想是借板垣的政治力量，将日本国内的阻碍力量加以消除而得实现，显示了石原在关东军的地位。事实上当时在整个关东军中，对“满蒙”问题能提出具体计划的只有石原一人，所以又有“石原即关东军司令部”之说。

石原是日莲宗的狂热信徒，在他的“世界战争观”一文（1939年3月）的第四章“佛陀的预言及其实现”中曾说，自大正8年（1919年）左右即为日莲圣人的信徒。这对于他的思想影响很大。

三、石原“世界帝国”的思想架构

（一）“八紘一宇”的皇谋思想

在石原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文字很明显地说明日本必须以传统的“八紘一宇”的祖训，实现统一世界的理想。这“八紘一宇”相传是二千六百多年前神武天皇东征大业告成，莫都大和（今奈良）的橿原，并颁诏敕，中有一段说：

“上则以答天祖授予乾天国之德，下则以弘皇孙养正之心。然后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紘以为宇。”可说是神武天皇开国的宣言和理想。这一理想，历代相承，遂造成近代日本的建国精神，也是战前大部分日本人的生理想。战前，许多国粹主义或右翼团体，诸如：爱乡塾、爱国学生联盟、亚细亚协会、恢弘会、关东国粹会、菊旗同志会、金鸡学院、兴国同志会、行地社、皇道会、大日本国粹会、国本社、黑龙会、樱会、七生社、神武社、赤化防止团、大正赤心会、日本产业劳动俱乐部、犹存社、老人会、浪人会、满洲青年议会、双华会、木曜会等，他们共同的宗旨都与“八紘一宇”四字有关，其中双华会、木曜会、樱会与满洲青年议会更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动团体。至于后来“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则完全建立在

“八统一字”的基础上。

（二）东方盟主、世界霸业的观念

石原莞尔其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世界之中不许有二君的存在，使普天之下、四海之民皆沐浴于日本皇威恩泽之中。用这种理念来治国，它的宗旨必定是富国强兵、雄飞海外的扩张主义。自丰臣秀吉的“大亚洲主义”，而至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后来果然吞并了朝鲜），竹越与三郎的“南国记”，宇都宫太郎的“东经60度与170度线的临终遗嘱”，以及1927年东方会议中，森恪所提出的东方构想与“满蒙计划”（即是“田中奏折”的内容）等，可说是一脉相承。石原继承了这些文化的遗产，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这种“霸业、盟主”的说法。

可以看出，石原的“霸业”欲望已表现无遗，这种欲望，在明治、大正及昭和初期的政治领导阶层和军阀中表现得特别强烈，他们想以世界总人口的1/30，世界土地总面积的1/350的条件，将其陆军发展为五强之一，海军则欲居三强之一，且更策划“五围政策”。无一不在作称霸世界的努力。这种心理更影响到一般国民。石原认为，霸业的建立，必须以战争为手段，他说：

自从英国击败西班牙、荷兰而成世界政治的霸主之后，复兴法国拿破仑大战，其世界地位因而确定，此后数十年遂成为英国在国际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德国当法国拿破仑时代，境内四分五裂，其后因民族精神之提倡及统一运动之推行，1866年之役，新兴的普鲁士取代了老大的奥国而得到盟主的地位，至1870年代则俨然欧洲大陆的霸主而开始与英国竞争。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得法国之助，赢得胜利，英国在欧洲大陆有全胜将军之美誉。这是他研究战争史的结论，英、

德之霸业是各国战争而达到的，所以他认为日本欲要完成霸业，亦唯有以战争为手段。

四、石原“满洲占有”计划的政经论调

(一) 经济论调

日本人对“满洲”的野心主要在其经济利益。盖自江户末年，日本受西洋炮舰的压迫而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引起了当时日本人的“危机感”，且日本人看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廷，受西洋束缚的痛苦，更加深了图强之心。当时，图强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效法欧美的资本主义做法——开拓殖民地、扩大市场以擷取经济利益，来促进国内的各项建设，故自幕末以来的“有识”人士，莫不主张“满洲利益”。石原在其“满蒙问题私见”一文中提到“满蒙”的经济价值时曾说：

满蒙的农产足以解决我国（日本）的粮食问题。鞍山之铁、抚顺之煤足以确立目前我国的重工业。满蒙的各种企业足以救济我国目前的失业者，并可开拓景气。满蒙的资源足以支持我国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

(二) 政治论调

以石原为代表的日本政军阶层人物，企图侵占“满洲”的政治因素除了上述称霸的政治心理外，尚可以下列诸点来分析：

其一，他们认为“满蒙”地方非汉民族领土。石原在其“现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一文中曾说：

满蒙非汉民族领土，其关系勿宁说与我国（日本）更为密切。在民族自决立场上言，“满蒙”是满洲及蒙古人的“满蒙”。满洲蒙古人与其说是汉民族不如说是大和民族来得确切。目前此地居民，汉人虽占大部分，但其经济关系若与中国本部相较，与我国较为接近。

其二，“满蒙”为日本国防上的要地，为统治朝鲜、支配中国之根据地。石原认为欧战以来，世界形成五大强国的局面，且有更进一步成为一个体系之势，其统治代表在西洋为美国，她与东方的代表——日本的争霸之战已成定局。故日本应速获得东方代表资格，俾与美国一争。所以当前日本的急务是迅速扩张其势力范围。“满蒙”为日本人口问题解决之理想地，且其丰富资源亦为日本所必需，它是日本在国防上取得良好位置并“雄飞”世界的重要条件。德国今日（指当时）国防地之不安定是由于19世纪英国霸业之兴而获得了有利的国防地位而致之，然而，由于美国海军的发展，英帝国的国防则面临威胁，足见国防地位与霸业关系之密切。日本在北方有俄国虎视眈眈，南方则有英美的威胁，故而“满洲”地方的呼伦贝尔、兴安岭地带，其战略价值特别重要。如果日本能完全控制“北满”，则俄国东进就不容易。如果，日本能免除北方的威胁，则进取中国或南取南洋的意图可得发展。所以，“满蒙”的确是日本国运发展的意要战略据点。

此外，石原又认为“满蒙”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后，则朝鲜的统治可初告安定，日本若以实力在此一地区上，表示解决“满蒙”问题之决心，则可立于指导中国本部之地位，以促其安定统一，且进一步可确保东亚之和平。

其三，由于中国政治之混乱，及对中国立国精神之误解，促使日本军阀对“满蒙”更大欲望。石原在昭和5年（1930年）7月10日在致横山勇的信中曾大胆地怀疑中国人统一国家的能力，他说：

“军阀、学阀、匪徒、政商等一部分人，为了个人的利益，使中国民众连年在战乱中，生灵涂炭，良民遂亦变成匪徒。为拯救4亿人民于水深火热，只有与列强合作，进兵中国，以维持

治安，别无他策。”所以他说为进兵中国去解救4亿中国人是“日本人的天职”（引石原语）而进占“满蒙”则当然是一种正常“正义”行为（引石原语）。此种错误观念之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利令智昏”，另一方面是发自日本武士的“使命感”，还有一方面当然是中国自民国初年以来，的确是军阀官僚、匪党、政客相继用私为乱，使国家陷于长期分裂之中，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央权力亦未完全统一。再证之历史，历代的朝代更换没有一次不发生流血革命，革命成功，大肆烧杀，将前朝的一切（包括好的措施），全加破坏，不为全民着想，只为个人泄恨。这情形看在日本人眼里，自然产生一种“中国人没有统一能力”的感觉，进而发出拯救中国人的“义行”。这些事实，对于中国历史一知半解的日本政客军阀是一种很大的诱惑。石原与板垣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整个关东军甚至是整个日本军政二界对“满蒙”有野心的军人政客的看法。

此外受19世纪西政殖民思想之影响，以及对中华民族统一意识之漠视等，亦是重要因素之一，此理至明，毋庸赘言。

综上所述，日本军阀政客攫取东北的企图，政治、经济为其重要基本因素之一，梁敬榘氏在其所著《九·一八事变史述》一书，将事变之原因归纳各说为真因三（中国民族统一意识被漠视，中日民族思潮冲突，中国外交政策之刺激），伪因六（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满蒙悬案三百余件，日本经济受压迫，满蒙统治权被迫害，中国非近代国家）；又提出其个人认为真因三（太平洋军事形势之转换，中苏关系之起落，满蒙分离运动之绝望）。而将经济、政治因素及人口等问题贬得毫无价值。此点值得提出重新检讨。笔者认为经济、人口、及政治等因素是事变的主因，日本新闻外交界于1931年至1934年所说之六因（即上述伪因），只是为了发动事变而制造的藉口，当然不足以

形成原因，而日本学者于战后所提之真因也只是表面的原因，如果日本军阀政客不是看中“满洲”的经济价值与政治利益而兴起野心，则中国人固然是一盘散沙，没有统一意识，也不干日本的事。中日民族思潮之冲突亦不构成侵略他国的要件。至于中国外交政策之刺激更不能作为发动事变的主因。梁氏个人所提之三个真因也只是促成事变的近因，进言之，因为日本有了根本上侵占“满蒙”的欲望，所以即令太平洋形势不转换、中苏关系不变，日本仍然要发动事变。

总之，“九·一八”事变之主因乃在于日本早抱着据“满蒙”为己有，将整个中国置于日本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先念，此种先念乃是日本自身之经济利益及称霸世界之政治企图所促成，因而观察时势之转变、制造藉口而发动事变，以达成其目的。

五、石原的满蒙统治方案

“九·一八”事变之前，1929年（昭和4年）7月，石原等在参谋旅行途中于满洲里说明他的“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显示日本必须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计划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为“平定”：先用武力扫除军阀官僚，没收公私财产，以巧妙方法将中国军队解除武装，讨伐逃兵及土匪。平定所需费用由没收所得及税收支应。

第二为“统治”：其方针为在军政下确立治安之维持，“日、鲜、支”（中、日、韩）三民族自由竞争，但以日本人经营大企业及智能事业（必须运用才能来经营的事业），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则从事小商业及劳动工作，各发挥其能力，共存共荣，行政上根本方针为尽可能避免急剧变化，维持现存体制。

治安方面以守备队为主体，守备队之活动以铁道线路为优先，其次在各县城配置若干兵力。各地方设置自治警察若干，以监视行动。宪兵直属总督，必要时得受命于道尹。财政方面以间接税为主，成立征税机构，支出预算军事费为6 500万日元（守备队2 500万；驻扎师团4 000万）；另行政费若干。金融产业方面交通、电信事业利用“满铁”会社经营之，大体上采用自由发展方式，但为战争需要，应研究对策加以必要之统制。司法方面采二审制度，道尹所在地设置法院。

第三为“国防”：用四个师团兵力以防备苏俄之侵入，对苏作战中飞机占重要地位，平时在四个师团中可减少若干兵力，增加飞行队若干；在北满呼伦贝尔一带作战，以机械化部队较为有利。以上三方面详细计划由各人分别调查草拟。

这是石原“满蒙占有”的原始计划，但事变发生后的9月22日，他改变了“占有论”，而要成立一个新国家，其原因据石原称乃由于建川美次（当时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只赞成建立一个亲日政权，石原遂不得不于9月22日与三宅光治（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贤二及板垣征四郎大佐、片仓衷上尉等会商，作成“满蒙问题解决策案”。

（摘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六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